

我与中国现代文学

六十年

苏光文 著

从史料出发，进行史的层面的体系建构，形成自己独立的、教学与研究思路、理论基点、论述方式与学术个性及学术品格。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我与中国现代文学

六十年

苏光文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与中国现代文学六十年 / 苏光文著. — 北京 :
华文出版社, 2023. 5

ISBN 978-7-5075-5472-4

I. ①我… II. ①苏…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文集 IV. ①I209.6-53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068878 号

我与中国现代文学六十年

作 者: 苏光文

责任编辑: 谭 笑 修文龙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67 58336253

责任编辑 010-58336237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6.25

字 数: 444 千

版 次: 202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5472-4

定 价: 9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六十年记略	(001)
“民主与科学”：五四时期鲁迅作品的文化意涵	(014)
《华威先生》引起的论争及价值意义	(023)
茅盾在抗战时期	
——纪念他诞生八十五周年	(033)
关于自由主义文学思潮	(045)
鲁迅·抗战·抗战文艺	(058)
抗战文学简论	(067)
国统区抗战报告文学刍议	(082)
抗战文学“凋零”论“开倒车”论质疑	(092)
巴金小说的“苦难情结”	(103)
国统区抗战小说泛论	(111)
论《学衡》时期的吴宓	(116)
胡风文艺思想理论及其影响	(128)
关于“七月”小说派	(144)
关于“中国诗坛”派	(157)
大后方文学对外交往片论	(167)
重庆电影对外交流	(186)
吴荪甫与赵惠明：茅盾小说中“另类勇者”形象	(198)
重庆与桂林：大后方文坛的双璧	(207)
大众化：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的显著特征	(216)
吴宓的“好梦”及其“难圆”	(226)
谷斯范《新水浒》的更新意识	(240)
左翼文学：30年代中国文坛的红色方阵	(248)
爱国主义：1937—1945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中心话语	(272)

张恨水《八十一梦》的批判意识与自省意识	(281)
启蒙主义：中国抗战文学的重现话题	(290)
方敬诗歌：“真与美”的寻绎	(299)
论桂林抗战文化资源的文学价值意义	(312)
老舍《大地龙蛇》的文化反思	(321)
文学与历史	
——中国现代文学视野里的“一二·九”运动	(331)
重庆陪都文学及其话语空间刍议	(340)
重读鲁迅“骂孔子”	(349)
赵树理延安时期小说的“忧患意识”	(357)
鲁迅与辛亥革命	(367)
后抗战文学及其长与短	(375)
关于人的文学思潮	(397)
后 记	(412)

六十年记略

不知不觉，我与中国现代文学“结缘”已六十年了。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不仅是我的职业，更是我的事业。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未因我退休而离去，一直与我相伴同行，完全融入我的生活与生命中。

六十年为一个花甲，是一个完整轮回。我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花甲轮回，在时间节点上，可分为三个阶段：执教初期（1963—1977年）；改革开放以来（1977—2000年）；退休以后（2000—2022年）。就基本样态来说，此三个阶段又可分别概述为：奉命教学，指令授课，迁校期间，游弋书海；任务牵引，兴趣驱使，理想确立，教研结合；退而不休，潜心治学，力图融会贯通，系统集成。

1963年9月初，我于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为西南大学文学院）毕业，随后留校被分到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组任教。我还未来得及去该组报到，就被派去参加农村“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去就是一年有余。其时，我与中国现代文学犹如一对青年男女只是刚刚有了恋爱关系，能否成为眷属，尚难预料。这便是我当时的顾虑与心理状态。不过，我是幸运的。一年多后我奉命返回学校，正式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组的一名教师。当时，系组领导给我四五个月备课时间，然后独立在一个年级上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基础课。这时，我的人生位置与人生目标锁定了。

1965年9月初，我主讲69届中国现代文学课，并做年级主任。当时，教学有全国统一教材和统一的教学大纲。我所讲内容，说不上有多少个人见解。好在这样千篇一律的教学模式，对我来说只有一年就结束了。

1969年，学校被迫搬迁，我获准在留守组工作。其实，留守组也无什么事可做。我从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在留守组三四年时间，可以说我饱读了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图书和报刊。学校搬迁，图书馆的图书报刊还未搬走。其时，图书馆只有一名我认识的长者在门口坐着看守。第一次，我与他闲聊一会儿，便被允许进馆看书。以后，我便自由进出图书馆了，只是不

能带书包进出，特别是图书馆四楼几大间的图书报刊，深深地吸引着我。那些图书与报刊已包装放进一个个大木箱或大纸箱。出于好奇，又无人监管，我便把一箱箱图书与报刊读了个遍。箱内的图书与报刊我完全陌生，如茅盾的《腐蚀》与《清明前后》、巴金的《寒夜》与《憩园》、老舍的《猫城记》与《四世同堂》、曹禺的《北京人》与《原野》，还有沈从文、丁玲、张爱玲、郁达夫的小说选，路翎的小说以及胡风的诗及文艺理论集子等；《新华日报》《群众》《七月》《抗战文艺》《文艺阵地》《东方杂志》《现代》《文学季刊》《洪水》《北斗》《小雅》等。我如饥似渴地读了几年，收获之一是知道这些图书与报刊属于中国现代文学时间段；收获之二是做了些笔记和抄写了些卡片（卡片是守门长者提供的）。这一最大收获和这几年的“偷读”，应该说给我后来的教学、特别是研究重点及走向予以潜在性的预拟。

1973年开始，我被推上教学第一线。根据安排，我主讲《鲁迅》和《毛主席诗词》。所讲内容当然属于同时期政治思想所主张的，个人见解与体会甚少。不过，我当时备课与讲授还是挺认真的。这两门课的讲稿，我一直保存着（2018年12月，被征集存入西南大学档案馆）。

在遵命于教学期间，还有一件事需说说。1975年9月，我应邀去扬州参加全国的中国现代文艺思想研讨会。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出省，一出又那么远，所以比较担心出行不便与安全问题，好在有朋友的帮助，总算按时赴会了。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同行专业会议，开始，我有些拘谨，两天后，就几乎完全融入其中了。我与《小雅》主编及西北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院、扬州师院、徐州师院、安徽师院等院校的前辈及同辈，相谈甚欢，有相见恨晚之感。参加这次会议，我的眼界大开，了解了一些中国现代文学思想理论及其论争概况。这为我以后的教学与研究做了一定积累。

二

1977年年底，四川几所大学教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的教师由四川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牵头聚会于成都，商议恢复高考后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事宜，决定新编一本中国现代文学教材，定名为《中国现代文学新编》。会议结束前一天，四川省委宣传部资深部长接见我们。他在讲话中要求我们加强抗战时期国统区文学研究，还要求重庆方面的现代文学教学老师多作这一领域的研究。会后分工，这一任务自然由我们承担了。回校后，我即找出原抄写的卡片和笔记本去学校图书馆翻阅已上架的几年前我翻读过的史料。一年

有余，完成了这一编写任务。参加这部教材的编写，我的收获颇多：一是详读了普遍用作教材的王瑶著《中国新文学史稿》、刘绶松著《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以及丁易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三部权威史书；二是较为系统地了解了我们这门课程的基本内容；三是我后来在查得大量的第一手史料之后，方能深深感到前辈们著的史书中存在的诸多话题需要重新言说，存在的诸多缺失需要弥补，存在的诸多文学真相需要探索，乃至“史观”及框架体系需要重新建构。可以说，这时，我的双脚才算是踏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大门。之后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约编国统区文艺思想理论史料，并拨款资助。校系领导也支持这项工作。有了项目，有了钱，又有领导支持，我便把教学之余的时间与精力全部用于史料搜集。两三年间，在北京、上海、广州、昆明、成都、重庆、北碚等省市地区的图书馆及重庆与南京的档案馆查得史料（包括五四时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史料）300多万字。除去完成编选任务，我还构建起新的教学大纲与新的教学体系，写出12本中国现代文学讲稿（2018年12月，被征集存入西南大学档案馆）。从此，也形成了一个研究课题，撰写出一本本专著和一篇篇学术论文。我常常把研究所得融入教学内容中，充实教学内容的厚度，提升教学质量，又把教学中发现的问题纳入研究，增加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做到教学与研究相结合。我还打算在三四十年代抗战文学领域里深挖十年八年，做出点名堂来。也是在这时，我的“学术研究无禁区，教学有纪律”的底线原则形成了！

1978年7月，我撰写的论文《郭沫若在重庆》，发表于翌年《西南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上。本文与稍后写成的已收入本书的另一篇论文《茅盾在抗战时期》（原题为《茅盾在重庆》），既表达我对郭沫若与茅盾两位文学家逝世的悼念，也从一个侧面展现出我的抗战文学研究是以重庆抗战文学为切入点的。这时，我从查阅的史料中已了解重庆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在1938年以后，不仅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中心，也是中国的文化文学中心，同时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所在地。由重庆抗战文学研究出发，向整个国统区抗战文学、边区抗战文学、港台地区抗战文学、沦陷区抗战文学以及中国抗战文学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交流的研究拓展，以作家作品为研究重点，达成史的体系建构。这便是逐渐形成的我的抗战文学研究路线图和研究目标。

1978年9月，我写成论文《论五四时期鲁迅作品中的民主意识与科学精神》，发表于翌年《南充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上。本文和已收入本书的《鲁

迅·抗战·抗战文艺》《重读鲁迅“骂孔子”》《鲁迅与辛亥革命》，表明我对五四时期文学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的研究是从鲁迅研究开始的。收入本书的《关于自由主义文学思潮》《论“学衡”时期的吴宓》《吴宓的“好梦”及其“难圆”》《胡风文艺思想理论及其影响》《巴金小说的“苦难情结”》《吴荪甫与赵惠明：茅盾小说中“另类勇者”形象》《左翼文学：30年代中国文坛的红色方阵》《方敬诗歌：“真与美”的寻绎》等论文以及未收入本书的《中国现代无产阶级文学及其生存境遇》《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鲁迅的“吃人”隐喻意涵》《茅盾创作的政治化倾向》《巴金的家庭文化拷问》《老舍“都市主题”的叙述》《曹禺“精神家园”的寻绎》以及《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概览》等30多篇论文，便是我对五四时期文学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的研读所得的实绩。

1980年6月，我撰写的论文《〈华威先生〉引起的论争及价值意义》，发表于翌年《重庆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上。本文和稍后写的收入本书的论文《抗战文学“凋零”论“开倒车”论质疑》，是我进入抗战文学领域最初的论辩驳难之作，旨在去伪立真、开辟研究路径。

1983年，我写的论文《抗战文学简论》，发表于翌年《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上。本文及其后三十多年间写的收入本书和未收入本书的50多篇论文，比如《国统区抗战报告文学刍议》《国统区抗战小说泛论》《关于“七月”小说派》《关于“中国诗坛”派》《略论抗战文学的审美效应及边区文学创作大众化特征》《工农兵文学及其引领价值》《张恨水〈八十一梦〉的批判意识与自省意识》《启蒙主义：中国抗战文学的重现话题》《老舍〈大地龙蛇〉的文化反思》《重庆陪都文学及其话语空间刍议》《抗战文学在香港》《战时台湾抗日新文学创作的审美特征》《赵树理延安时期小说的“忧患意识”》《丁玲小说的启蒙意识与抗争意识》《张爱玲小说的“荒漠化”情感透视》《抗战文学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交流片论》等，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审视抗战文学，呈现抗战文学繁富的意义世界和多样化的艺术特征。这些研究所得为我这期间从事体量较大的学术专著的构思与撰写提供了多方面的准备与厚实的基础。

1983年，我协助招收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抗战文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1985年，经批准，我正式成为该专业该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我先后为硕士生开“抗战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及“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研究”三门学位课程；我给本科生上专业基础课，还为高年级本科生开“中国现代文学专题研究”选修课。

1983年9月和1984年1月，我先后撰写完成两本书。一本为《抗战文学概论》，1985年12月于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一本为《抗战文学纪程》，1986年4月于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抗战文学概论》重在探讨抗战文学运动、抗战文学思想理论和抗战文学创作中带倾向性的问题，并把抗战文学放在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去考量与研究。《抗战文学概论》是继蓝海（田仲济）1947年出版的《中国抗战文艺史》后的第一部抗战文学研究论著。《抗战文学纪程》是我查得的抗战文学史料的结集。在《抗战文学纪程》中我将抗战文学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以编年体方式编入。这不仅为读者和研究人员提供了大量史料和查阅原始史料的目录，同时又显现出抗战文学发展脉络，展现了抗战文学的成就，史料的双重价值得以凸现。但今天来看这两本书，存在缺失自然不少。

我策划并担任主编的“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丛书”《文学理论史料选》《小说研究史料选》《诗歌研究史料选》《戏剧研究史料选》，由四川教育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1989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大后方文学书系”中的“小说编”六卷本由我选编，艾芜主编。

1986年，我与本校历史系及政治系各一位教师联合申报的国家人文社科课题“抗战时期国统区研究”获准立项，我负责国统区文学研究。此项目获准既是对我这之前抗战文学研究成果的一种检阅，也是对我这之后研究的一种激励。

1989年年初，我开始构思并撰写的《抗战诗歌史稿》，于1991年12月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本书包括“引论：抗战诗歌滥觞期”“上篇：诗坛巡礼”“中篇：诗派诗人举要”“下篇：旧诗新话”，点面透视，层层递进，力图展现抗战诗歌的发展走向及抗战诗歌取得的成就。本书为“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丛书”之一。

1990年12月，我开始撰写的《大后方文学论稿》，于1994年12月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是教育部“八五”人文社科项目最终研究成果。本书共5篇29章，从对大后方文学的历史叙述再评议开篇，到对大后方文学思想理论及其论争的缕析、大后方文学创作意义世界的解读、大后方文学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交流的概述以及中国大陆抗战文学与中国港台地区抗战文学之关系的阐释，史论结合，自成体系，是一部有一定理论深度的大后方文学史论著。说起这本书，至今还存着令我挂怀的一件事：1991年10月的一天，我带本书书稿去成都参加四川省社联召开的理事会时，到时任一家出版

社副社长的我的大学同学家里，请他帮忙出版。他大致翻阅书稿后，表示“一定出这本书”，又说要等到他手中的一本畅销书出版后。我理解，自然同意。他送我出门时，又表态：“我一定出版这本书，放心！除非我死了……”我打断他的话，说道：“言重了！言重了！”一年后，我再去他家时，不料他却去世了！我心疼，我惋惜，我安慰生者！我要回书稿后，恰逢申报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以“大后方文学研究”为题填表申报，后获准立项，并得到资助。还未到项目结题时间，此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大后方文学论稿》便出版了。本书的出版带有纪念我这位去世的挚友之意。

1995年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重庆市政协牵头编写大型“重庆抗战丛书”，以资纪念。我应约撰写《抗战时期重庆的文化》和《抗战时期重庆的对外交往》。时间紧，任务重，我便约请几位相关专业学者教授参加编写这两本书，我担任主编。这两本书于同年8月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20世纪中国文学”主张提出后，呼应者众多。四川及云贵部分高校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人员也想发声呼应，便于1994年9月聚会于重庆。同行们推我担纲撰写一部《20世纪中国文学史》。我接受任务后，用大半年时间集中研读大量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和不同时段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材，感悟出“文学和人的关系”应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中心线索。围绕着它的确立、调整、转换，形成较为鲜明的发展阶段。我便以此为“史观”，作为本书框架体系的理论支撑和选择作家作品的视点。看重的是作家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地位和作品达到的思想深度及艺术独创性与审美特性。我的见解得到参编同行的认可。两年后，两卷本《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和两卷本《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选读》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后，多次再版，全国三四十所高校用作本专科基础课教材。在编写这部教材过程中，我提出了“文学和人的关系”的“史观”，并倡导写史、讲史应有“史感”。

1997年与1998年，我先后申报并获准国家人文社科项目“爱国主义——1937—1945年中国文学母题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中国现代无产阶级文学研究”。这两个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由我主编、几位研究生参编的同名专著于2001年、2004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前者7章22节，对爱国主义谱系进行历史追问与意义探索，辨析爱国主义之于中国具有的独特文化文学意涵，凸现1937—1945年中国文学中爱国主义的历史传承与现代转换；着眼于这一时期中国文学意识的开掘，从其特定而典型的基本词语，即“孤愤”“苦难”“解放”“批判”“承受与担当”等词语进入，带出繁富的意义世界；把这

一时期不同地区的文学纳入共同的爱国主义话语系统，写出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精神史”“思想史”“行为史”。后者包括“导论”和上、中、下三篇，把中国现代无产阶级文学的历史进程及生存境遇、文学理论的价值意义、文学作品的文化内涵，有机勾连起来，形成一个整体，详加论述，指明中国现代无产阶级文学不仅是一种文学，在更大程度上还是一种政治色彩浓烈的思想意识，实证中国现代无产阶级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历史上绵延不断的一块巨型红色文学方阵。

在职期间，我给本科学生上专业基础课和给高年级学生上选修课，基本上是下课就走，与学生交流时间甚少，了解学生需求不多。好在学生们求知欲望较强，本课程的基础知识与基本理论均能掌握与吸收。不少学生对知识的渴求以及他们的活跃思想，令我感动。那些喜欢听课的学生和频频发问的学生，我的印象还是很深的，二三十年后他们回校聚会谈及时，其景况还历历在目。

我带硕士生，基本上类似“师傅带徒弟”。当年，每届硕士生，一个导师最多只能招两人，并规定待三年毕业才能再招再带。学位课程都在我家讲授。上完课，闲聊机会较多，大至社会人生、婚姻恋爱以及课题选择，小至同学关系的处理，等等。有时，上完课赶上饭点，就留在我家吃便饭。师生关系极为融洽。他们一边学习学位课与公共课，一边从事科研，几乎都撰写和发表有学术论文。比如有位研究生的学术论文《忧郁及忧郁的几个意象——端木蕻良早期创作论》发表于《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于同年第9期全文转载；又比如一位研究生的学术论文《穿越城市文明的三次精神还乡——沈从文小说的心理阐释》，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4期。

三

2000年1月，我退休。“退”而未“休”。一是继续完成前述的国家和教育部的各一项人文社科课题的研究；二是继续带尚未毕业的全日制硕士生和为在职人员申请学位的课程班上学位课程，指导学位论文写作。2003年，校内这些工作完成后，我被一家民办大学聘去讲授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基础课，并指导同门课程任教的年轻教师，一直到2013年7月，才完全离开大学讲台。这期间，我继续思考中国现代文学有关问题，并撰写专著和学术论文。

抗战时期，重庆陪都文学在中国抗战文学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以及中国

现代文学史上的分量和地位，我是知道的，我很想把它作为一个单项课题进行研究。2005年9月，重庆举行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暨抗战文学研讨会，我应邀参会。我提交的论文题目为《重庆陪都文学：灰色人生战场的文学叙述》。2009年1月，我把几年前写成的这篇论文缩减并改题目为《重庆陪都文学及其话语空间刍议》，直接寄给重庆市社联所属的一家刊物，很快被采用发表了。我很兴奋！立即着手修改我已写成的《重庆陪都文学论纲》并改题目为《重庆陪都文学研究》送出，中国戏剧出版社于2011年7月出版了。这本书呈现出重庆陪都文学的完备文学制度、繁富的文学创作、双向的对外文学交流，还原其整体历史面貌，探寻其共时性与历时性的价值意义。我的抗战文学是以重庆抗战文学为切入点的，但这本书才真正实现对重庆抗战文学的整体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这个称谓，似乎是从1955年7月出版的丁易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才正式开始用的。这之后，国内出版的这门课的教材和课程名称一律用“中国现代文学史”或“中国现代文学”了。我读大学和教大学这门课，都叫作“中国现代文学”。不过，我偶尔也用“新文学”称谓。2013年2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我的专著就用的是“新文学”称谓（全称为《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研究》），本书以历史时间为节点，以“文学和人的关系”史观的确立、调整、转换为依据，构建框架体系。本书是我几十年来为本科生上专业基础课《中国现代文学史》讲稿的再修改，自然融入了我几十年教学与研究的所得。

《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研究》出版后，本打算休息一两年再思考写点什么的，不料，本书出版才三个月，四川省社科院文学所约我加盟“中国·四川抗战文化研究”重大社科课题，并约定我承担“重庆文化”子课题的研究与撰写。我和该所曾有过合作，便欣然同意了。我用半年时间查寻未掌握的史料，一年时间完成撰写任务，书名为《大轰炸中的重庆文化》，由中国文联出版社于2015年8月出版了。这本40余万字的著作，全面而系统地论述大轰炸中的重庆文化，其中涉及文化组织机构、文化思想论争、学校教育、文学、音乐、美术、宗教哲学、新闻传媒、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成果等方面的内容。重庆文化在大轰炸中依然得到大发展大提升，成为重庆和重庆人乃至中国和中国人在血与火大劫难中巍然屹立，悲壮而绚烂的象征。

2014年1月，文学院举行团拜会。闲聊时，一位教授建议我写一本“苏光文说抗战文学”。我未迟疑，便说：“可以考虑！”“未迟疑”，并非出于一时

冲动。因为我在整理和撰写《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研究》专著时，就萌生了要用时间好好反思若干年来我的抗战文学研究的想法。所以，我在完成《大轰炸中的重庆文化》后就全力思考和撰写《我说抗战文学》。本书于2016年1月由黄河出版社出版。本书对我三四十年来抗战文学研究成果进行了历史性检视，带有“盘点”与“总结”特征，个人化色彩甚浓。九个言论话题中，有重新言说的，有维持原言说的，有新言说的。其中，“后抗战文学”是我提出的新话题，重在言说它对抗战文学中“抗战的文学”精神内容的延续与拓展，并对“后抗战文学”发展概况、创作特征以及得失予以评述。本书和前一本书的撰写，确实颇耗费我的心力。完成后，我真的感到该停止了，该休息了。

停止写作一年有余。2017年9月，文学院党政领导决定出资出一套“前辈文库”（后改名为“雨僧文库”），“以传承文脉”，我被列入。根据要求，我按时向出版社交去“齐、清、定”的书稿《新文学：新观念新文本新交流》，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20年3月出版。文库共13册，收有中文系——文学院80年学科历史上近70年中五代部分学者各一项成果。领受、担当、坚守，似乎为一以贯之的文脉。

2019年3月，我清理书架时，在一书柜角落处发现了我寻找多时的一本书稿，题目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五十年》。本书稿均由原创文章构成，其中还有几篇不曾发表过的文章。翻阅这些文章时，勾起了我撰写或发表这些文章前后不少有趣的故事。于是，我决定以这些文章为主，再把近10年写的已发表和未发表的论文纳入，重新编撰成一部专著，定名为《我与中国现代文学六十年》。本专著第一部分为“六十年记略”，记叙六十年间我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概况及其走向。第二部分选录我写的论文35篇，按写作与发表时间先后排列，呈现出我的研究历程。这35篇文章，是从我撰写的90余篇文章中选出来的。每篇论文后，设置“附记”，内容包含有我撰写论文点点滴滴的故事，撰写论文的初衷、原委、发表论文的刊物及时间，以及转载，等等，还包含有我现今对论文的看法和对论述对象的见解。

这里，我要说说退休后我在一所民办大学工作的10年。这10年，可以说是“我与中国现代文学六十年”中最为快乐的也是很有成就感的10年。

这10年，我结识了本市多所大学退休后来校工作的正副教授。大家在同一平台上各自尽力发挥“余热”并心无芥蒂地交流教学经验和学术观点。闲暇时，聊聊天，散散步，还一起参加“红色旅游”。

这10年，我为中文专业每个年级开设一门专业基础课和为大三开设一门选修课。这所民办大学的学生，有从经济和教育较发达的省市来的，有从西部地区来的，也有从民族地区来的。他们的知识积累、学习态度与学习方法，不尽相同。就我的摸底所得，约呈现三种状况：1/3的学生是不爱学习的，1/3的学生是父母逼着学习的，1/3的学生是爱学习的。真正爱学习而又会学习的学生，在一个年级约占1/20。面对这样的教学对象，我以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来提升爱学习的，吸引被迫学习的，拉动不爱学习的。学年考试成绩，一个班上85分的有10人左右，上六七十分的40人左右，不及格的3至5人。选修课的内容，我有意向考研学生倾斜。我在新生入学教育的专题报告中和大一第一学期第一节课时都要讲讲考研问题，鼓动学生考研——从为自身发展和教师们拥有的资源两个方面去讲。我告诉他们：任课教师多为正副教授，一些教师原本就是硕导，他们的学生中不少人已在大学任教，且已做硕导甚至博导了。他们会纯义务地为考研同学奉献出自己的人脉与文脉。事实上，我和几位教授，已先后为三四十位学生考研“保驾护航”。就考上现代文学专业的硕士学生来说，我至今还记得名字的就有多人。

这10年，我与学生在年龄等方面是隔两代的，但又似乎无多大代沟。他们除课堂上称我为苏老师外，课后几乎都叫我“苏爷爷”。当然，我不曾称他们为“孙孙学生”。一声“苏爷爷”，一下子好像就拉近了我们师生的距离，大有一种亲切、亲热之感。“课堂有纪律”，我们都遵循这一底线。课外，我们确实“随心所欲”。三三两两一起，谈人生、谈家常、谈学习。食堂遇着了，他们请我吃饭，我也请他们吃饭。过去的师生关系，难有这般的融洽。

这10年间，给我印象最深而不会忘却的学生有多人，比如，有一位学生，爱学习又会学习，记忆力特强，似乎过目不忘。大学四年中，包括体育课成绩在内，所学课程每学年平均成绩都在93分以上。她的分析能力与写作能力也跟她的名字一样，朴实而又多彩。又比如一位学生，既爱读书又会读书，她对文学作品的解读能力与撰写论文的能力特别出众。记得大一上学期第10周期中考试，我出的开卷试题为《解读废名的〈竹林的故事〉》，要求3000字以上，学术论文格式，两周后交卷。我阅她的试卷——打印的一篇学术论文《意的表达与象的构筑——废名小说〈竹林的故事〉解读》时，感到“惊奇”和“疑虑”。另两位教授看后，也有同感，并认为“要么抄袭，要么高手！”事后，我和她交谈，了解了她拥有古今中外文史哲各类学科知识理论的积累状况和平常爱读爱写论文的习惯。于是，我的“惊奇”变为“惊喜”

了，我的“疑虑”变为“信任”了。上海召开“周文学术研讨会”时，我推荐她撰写周文长篇小说《烟苗季》学术论文赴会。她的论文《无药可治的生命之痛——周文小说〈烟苗季〉解读》获得会务组认可，收到正式邀请函。大学毕业论文，解读的是铁凝的长篇小说《大浴女》，万余字的论文《平庸之恶与艰难救赎——解读铁凝小说〈大浴女〉》，是我教学生涯中阅读过的大学本科毕业论文中少有的佳作。

这10年，我完成国家人文社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各一项，撰写与出版4部学术专著，撰写和发表18篇学术论文。

四

抗战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辈学者们囿于一些原因少加关注。20世纪80年代前，抗战文学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最薄弱的领域，禁区、误区、盲区，大量存在。我因“机缘巧合”一步步进入抗战文学领域而不能自拔。这期间，形成这样的研究过程和研究样态：从追踪报刊史料和档案史料以及能成为这两类史料之佐证的个人记忆史料，到鉴别与整理史料；从单项视点到单项视点与综合视点结合，达成史的体系建构。由此，我发现因“右倾”论造成国统区抗战文学成为研究禁区，因“凋零”论与“开倒车”论造成抗战文学成为研究误区；由此，我发现前辈学者关于“华威先生”及其引起的论争等问题的言说多为误认误导；由此，我更发现港台地区抗战文学、沦陷区抗战文学和“中国诗坛”派、“七月”小说派以及中外文学交流成了研究盲区。为开拓和深化抗战文学研究，我本着“勇闯禁区、厘清误区、填补盲区”的探究原则，先后撰写并发表有关学术论文60余篇，先后撰写并出版有关学术专著20多部。这些著述文字，包含着我为探索抗战文学历史真相、还原抗战文学历史本来面目而怀有的初心；这些著述文字，负载着我为探寻抗战文学史观、研读抗战文学意义及梳理抗战文学对外交流、彰显抗战文学成就和历史地位，而一路披荆斩棘，论辩驳难所拥有的智慧、胆识和定力。这些著述文字，自然也呈现出我的抗战文学研究还存在一些纰漏。

我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五四时期文学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的研究，与我对抗战文学研究一样：研究过程与研究样态以及史的体系建构相同，“闯”与“干”无异。“闯”——破以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对文学思潮及文学作品划线的惯例，为吴宓及其为代表的“学衡”派、“新月”派、“现代评论

派”正名，发现“人的文学”思潮、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中国现代无产阶级文学思潮，等等。“干”——实干，苦干，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坚韧不拔。我撰写并发表的30多篇学术论文和编撰并出版的8部专书，便是相关研究成果的结集。尤其是，我主编并出版的两卷本《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和我撰写并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研究》，更融入了我几十年间教学与研究所得。其精要之点有三：一是王国维和鲁迅拥有的，陈寅恪、吴宓、老舍、胡风等人坚守的独立意识和自由思想，乃中国现代文学（或称中国新文学）作家、学人之德之魂。二是1918年5月，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警告式说道：“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对此，1932年8月，老舍来了个无缝连接而发表了《猫城记》，叙述了两万年文明史的猫国的灭亡和猫人的死光，根本原因是猫人自相残杀。承接而来的是1941年丁玲及其作品的启蒙与救亡意识。1943年及其后几年间赵树理作品的忧患意识与抗争意识，乃中国现代文学（或称中国新文学）永葆青春的精神内容与精神动向。三是1943年，张爱玲在《金锁记》末尾说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沉下去了，三十年前的人死了，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时光流逝，物非人亦非，然而中国现代文学（或称中国新文学）演绎的精神内容与精神动向，如永不干涸的河水，从昨天流到今天，流向明天。这三点，也是我悟出的理解的中国现代文学意涵的“现代性”所在，或称中国新文学意涵的“新”所在。

六十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直接或间接地支撑着激励着我徐徐前行。我直接或间接地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作了这样几个方面的努力。一是强调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须从史料出发；二是主张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需有史家眼光与理论气度；三是提出中国现代文学“文学和人的关系”新“史观”；四是运用纵向勾连与横向类比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五是经年累月地进行抗战文学研究，探索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文学阶段的原本真相，还原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完整发展过程；六是积极参加中国现代文学学位点的申报与建设，较早成为硕士生导师；七是适当参加境内外中国现代文学学术交流活动；八是真诚地扶助有德才的青年教师。而今，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已进入一流学科行列，我特表祝贺！

六十年来，我专心于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努力做好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尽量做到“上动下静”。“上动”即动脑筋；“下静”即屁股与凳板结合。守住底线，耐住寂寞，吃自己的饭，做自己喜欢的事，这大抵是“我与中国现代文学六十年”间的人生况味。